

@ 一语惊人 @

纪念“8·15”，正义的警钟应长鸣

68年前的8月15日，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，第二次世界大战——人类历史上“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”最终结束。

战争必然带来苦难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便以“人类绞肉机和屠宰场”的恶溢载入史册。但二战，唯独二战，却经常被称为“善战”。

何以谓“善”？只因这不是以往弱肉强食式的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战争，而是一场全世界人民奋起反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与暴行的正义战争，一场善良最终战胜邪恶、光明最终战胜黑暗、文明最终战胜野蛮的战争。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。

不幸的是，战争发动者的罪恶，因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心态，在战后的日本未能像德意那样进行全民清算，更未能为后代日本人民所周知。日本极右势力一直企

图用“胜王败寇”、“战胜国对战败国”的逻辑，消解二战的正义性质，并利用原子弹爆炸的悲剧，反复渲染“受害国”心态，而对日本当年加害他国、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，百般抵赖否认。

对此，日本知名作家渡边淳一曾以《一百种理论不如一份良心》为题，回忆中国和朝鲜半岛民众因日本侵略遭受的非人待遇，指出：“同样一件事，加害者和受害者理解的方式会有天壤之别……加害者的任何理论、任何辩护都是苍白的。因此，日本决不应该企图用暧昧的语言逃避现实。”

多年来，有良知、有勇气的日本人士也不断发出正视历史的呼唤。史学家井上清生前自剖心迹：之所以考证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史实，就是为了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借尸还魂、再启战端。在作品中

详细揭露七三一部队罪恶的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：“以反省历史来揭露社会弊端，追求人生的真谛，这才是我写作的目的，是我生存的意义。”

可惜，现任安倍晋三政府不但全盘继承极右历史观，而且走得更远。去年上台前，安倍就有意修改承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“河野谈话”和对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“村山谈话”。今年3月，安倍公开为供奉在靖国神社的甲级战犯洗刷罪名，称东京审判是根据“战胜国的判断裁定的罪名”，不是日本人的定罪。4月，安倍抛出“侵略无定义”论。7月7日——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日，安倍宣称“为历史感到自豪”，再度令邻国和国际社会震惊。

“了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他(安倍),”日前,在广岛原子弹

爆炸纪念仪式上,好莱坞名导奥利弗·斯通对安倍政府之无视历史提出尖锐批评。

历史归根到底是由正义者写就的。如果那能胜正,人类文明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进步。68年前日本的战败,根本原因在于侵略他国的非正义性质。在这场战争中,日本首先是加害者,最终因加害他国的罪恶,把本国人民也拖进受苦难的深渊。

渡边淳一的反思发人深省：“(日本)不愿意道歉也必须道歉，因为我们的父亲、祖父或者曾祖父，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和我们一样的血。虽然我们的家族认为他们温文尔雅，但他们毕竟在那场疯狂的战争中，成为癫狂的人。”

为了不再发生战争，为了不再制造“癫狂的人”，纪念“8·15”，正义的警钟应长鸣。(据新华网)

民企代管公车不妨一试

近日，昆明雄霸车辆经营管理服务所把《申请书》递交云南省统计局，希望参与政府公车管理。雄霸在《申请书》中承诺：愿交保证金100万元，保证做到“严禁党员干部公车私驾、公车私用”，而且“满意再付费”。

熟悉现代政府运作方式的人都知道，政府后勤保障社会化是大势所趋，也是降低办公成本的有益做法。民企代管公车，其实就是公车社会化化管理，不妨一试。

这些年我们治理公车私用，办法出台了一个又一个，但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。现在有企业主动垫付资金，解决公车私用问题，这对政府来讲有百利而无一害。

数据显示，全国公车数量为200多万辆，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~2000亿元。而根据一辆公车“公事占1/3，领导私事占1/3，司机私事占1/3”的理论，如果社会化管理真能杜绝公车私用，那么每年节约下来的费用将有千亿元之巨。

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不但应该允许企业介入公车管理，而且还应该引入竞争机制。这样，既可以降低运营成本，又可以提高服务水平，还可以避免服务企业与公车单位相勾结，产生新的腐败。

当然，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并没有权力进行这方面的改革，但正如云南省统计局所说，如果是上级部门下派某民营企业来管理公车，这才是较好的渠道。既然如此，上级部门不妨主动介入，先考虑在几家单位试点。(刘昌海)

“证件”风暴



新闻:8月3日晚，河南省太康县毛庄镇邵塘坊村，一辆警车突然来到村民张怀兴家，因警察拒绝出示证件，被村民围了起来。一天以后，该村20名妇女被抓，其中有9人被太康县警方以“涉嫌非法拘禁罪”刑事拘留。(8月13日中国新闻网)

什么！要出示证件，难道看不出我们是警察吗？除非说几个人半夜里硬生生闯入民宅，还带着一身酒气是警察的标准行为模式，但警察的执法规范显然不是这样的，村民更觉得这些人像十足的流氓。

警察执法首先就应向当事人出示相关证件。既然是执法，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为什么要搞得神经兮兮，莫非是自个儿心虚，抑或是对法律和群众的不屑？

这些村民严重冒犯老大，必定是一群“刁民”，哪能不给点颜色看看，不然就“翻了天”。村民们自以为还懂点法，知道大家都要依法行事，殊不知当地公安部门更加“专业”、更有手段，因此也更有威慑力。罪名很快给安上，“嫌犯”迅速被抓捕，那迅猛行动的阵仗，有4名妇女当场“受到惊吓发病晕倒”。

图/曹一

“神医”的谎言为什么值钱？

最近“气功大师”王林被拉下神坛后，昆明“治癌神医”王学贵也引起媒体关注并受到各界质疑。对此，王学贵竟愤愤不平地大骂“王林牵连了我”。记者调查发现，不仅他本人吹嘘的所谓神奇医术根本无从考证，而且又是一个非法行医的典型案列。(8月13日《北京晨报》)

按照“治癌神医”的说法，他已经治好了2000多个病人，每个病人大概收3万到6万元的治疗费。所以说“王林牵连了我”，其实是说坏了我的财路。我对他们的私人恩怨不感兴趣，让我真正好奇的一个问题是，“神医的谎言”为什么值

钱？首先谎言等于失真的话，没有客观依据，难以产生现实效果，治不了病，也解决不了癌症病人的问题。但为什么有市场，还产生了这么大的经济效益？在执法人员盘问下，王学贵道出了令人错愕的“神医”诞生经过：偶然挖到一棵草药，经牛羊试吃后发现具有治病疗效，于是配成药方给人看病……也可以说，它技术含量极低，或者说生产成本接近为零。但铁一般的事实是，很多人的确需要这样的精神鸦片，只负责上瘾，不负责结果。

第一个分析是，因为有足够多的人愿意相信谎言，谎言才有需求，

需求越强劲，市场越大，价格越高。愿意相信谎言，其实也等于不愿意鉴别谎言和真话，怀疑精神缺失。

第二个分析是，癌症病人的心理容易绝望。脆弱和绝望会让人失去力量，其中包括判断力。癌症和绝症的病人，往往是骗子们最喜欢的行骗对象。

时常被忽略的一个常识是，就医者找医生提供服务，购买的本来只是一个专业判断和建议，而不应该是一个笼统的结论。事实上，医生认识疾病的这种资源也是有限的，而不是全知全能，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但现在，很多人就医，对判断和建议的质量丝毫不感兴趣，唯

独只对结论感兴趣。结论好，即对医生膜拜和信任，觉得充满了力量。结论不好，即怀疑和敌对医生，觉得选错了人。从市场的角度而言，神医的结论是独一无二，世界上最漂亮的——晚期癌症的治愈率高达95%，连获得诺贝尔奖的专家们都没办法实现的结果，他却夸下海口。当然非一般人，只不过是一个可恨的骗子而已。

对好结论的需求火热，是因为信徒们根本不关心判断——结论从哪里来？怎么得来？你总不能指望“神医”会老实巴交的主动告诉你，他只是偶然挖到了一棵草药。

(吴帅)

规范职务消费 须靠公开透明

住酒店要五星级，坐飞机要头等舱……新华社记者日前在北京、河北、江苏、安徽等地调研发现，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出现挥霍如土现象，职务消费演变成“不落腰包”的腐败，不当职务消费像一个个“黑洞”吞噬着国家财富，引起群众不满。(8月13日《新民晚报》)

职务消费打着公务所需的名义，其消费资金不直接装入个人腰包，就不会被纪检部门查处，尤其现有的政绩考核主要看办成了什么事，而不看怎样办成的事。比如，“跑部钱进”现象，地方官员到部委“汇报”工作争取支持，其中多掺杂有公款送礼、请客等行为，而相关支出列入了正常的职务消费领域，不正常现象变成了正常现象。

目前，国家正推进“三公经费”公开，“三公经费”只是从消费项目上划分，其实消费还体现为每个官员的各类隐藏的职务消费。“三公经费”公开无法解决官员职务消费的暗箱操作问题，而职务消费暗箱操作则会造消费行为存在比着多花钱的隐患，因为只有多花钱才有可能办成事，或只有多花钱才有可能落到好处。据报道，现在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盲目攀比，吃喝玩乐，生活挥霍，有的甚至违规挤占挪用扶贫、支农、救灾等款项，或向有关单位或企业转嫁费用。

规范职务消费需要禁令，比如国家有关部门已出台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高管职务消费的规定，但再多的禁令也抵不上一纸公开，只有公开才可能让官员比着少花钱。国家有关部门应在推行“三公经费”公开的基础上，推行官员个人职务消费公开，财务部门按官员个人编制年度职务消费预算并按个人分户记账，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。只有将职务消费行为展示在阳光下，不规范的职务消费行为才会逐渐收敛和杜绝。(吴兰友)